

论鲍曼的后现代性思想

何 芳^①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沙 410081)

摘 要: 齐格蒙特·鲍曼是当代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著名的理论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高超的文笔在理论界中独树一帜。近年来,鲍曼的后现代性概念、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关系及后现代性给人类生存状况带来缺憾等言论,日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对当代西方社会现实和人类生存状况给予了很好的反思。
关键词: 齐格蒙特·鲍曼; 后现代性; 现代性

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 1925 -) 是英国利兹大学和华沙大学社会学的退休教授,当代西方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1925年,他出生在波兰波兹南市一个贫困的犹太家庭,承受过贫困和反犹太的痛苦,这些经历都为鲍曼后来的学术生涯提供了经验资源。澳大利亚的学者彼得·贝尔哈兹 (Peter Beilharz) 称鲍曼为“当今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他生活在英国利兹,却通过卫星看波兰电视台的节目。鲍曼涉猎过很多领域,并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写作,而他的思想漂浮不定,既有说服力和启发性,又令人费解。”^[1] 鲍曼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在他众多的著作中,他本人把《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和《现代性与矛盾性》称为“现代性三部曲”。贝尔哈兹教授则把《后现代性伦理学》《生活在碎片中:论后现代道德》《后现代及其缺憾》称为鲍曼的“后现代性三部曲”。从这些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出,鲍曼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多维度、多侧面地深化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研究主题,提供了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最有力的理论分析。本文主要介绍鲍曼后现代性思想中的后现代性概念、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关系及其后现代的缺憾这三个最重要的方面,以期更为深入地解读整个鲍曼后现代性思想体系。

一 鲍曼眼中的后现代性

后现代性理论在学术界一直呈现出多元化和多视角的研究,当代西方知识分子广泛运用后现代性思想,并已经占据了许多文化知识领域。但是,要对

后现代性作精确的定义却困难重重,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含糊不清的文化:首先,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理性和科学文化相对立,所以不能用现代的逻辑和语言表达方式去言说它。其次,它本身思想非常繁杂,具有很多不可表达和不可言说的部分。最后,西方的一些后现代大师都未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就熟悉的名字来看,有一些公开使用后现代术语的,如利奥塔、詹姆逊和有‘后现代大祭师’之称的鲍德里亚,而另一些被更能见出后现代精神的大师则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研究的是后现代性思想。如当年号称巴黎后结构主义三巨头的拉康、福柯和德里达,以及美国的后分析哲学家理查·罗蒂。”^[2]这些都给后现代性的准确定义增加了阻碍。随着后现代性思想内容不断丰富和扩充,西方学术界的著名学者对后现代性也有着不同的论述。著名的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他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把“元叙事”视为现代性的标志,把“后现代性”定义为“不相信元叙事”;他对现代理性主义哲学将知识的合法性建立在“元叙事”之上的规范模式提出挑战,认为后现代性的思辨语言游戏的规则不再具有合法性。当代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则明确肯定“后现代社会”、“后现代时期”的存在,把它对应于“晚期资本主义”这一社会阶段,在詹姆逊看来是一个与“二战前的旧社会彻底断裂”的“新型的社会”,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某个时间,曾被冠以“后现代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等名称,其主要特征包括:

① 收稿日期: 2008- 11- 04
作者简介: 何 芳,女,湖南浏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新的消费类型,有计划的产品换代;时尚和风格急速起落的转变;广告、电视和媒体对社会无处不在的渗透;庞大的超级高速公路和驾驶文化的到来,等等。

面对学术界关于后现代概念的含混说法,鲍曼保持着冷静和清晰的头脑,他首先就指出,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他也赞同“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首先是被用来指称那些反叛者,他们反对功能主义的、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理性化建筑,不久,这个概念迅速被接纳并扩展,西方艺术所有意义深远的转折都被纳入这一概念……只是到后来,最初被定位于艺术史领域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开始向外延伸。”^{[3] 157-158} 所以他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在后现代性的条件下或在后现代性的阶段中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或知识作品的总和。不仅如此,鲍曼还进一步指出,后现代性也不同于后工业社会概念,“它是指在思想氛围中的一种清晰明了的性质,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元文化立场,一种对时代的明确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的基本要素之一便是认识到现代性已完结,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现代性,已划上了句号。现在可以对这一时期进行全面的思考,通过反思,不仅可以理解其理论追求,而且也可清晰地了解它的实践成果。”^{[3] 158-159} 由此可见,鲍曼认为后现代性就是反思智慧,“重新调整了我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对其诸种特征的重要性的顺序,重新作了排列。”^{[3] 159} 过去现代性所建立的确定性和普遍性的价值体系已经转向后现代的不确定性、多元化和特殊性价值体系,在新的情境中多种价值观和缺乏支配性的整体结构可以共存,现代性所确立的客观标准已经行不通。这就是鲍曼所要描述的西方社会和文化巨大转变所在。鲍曼的后现代性的首要特征,是认为世界是多元主义的,不否认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可以共存。后现代的生活原则上是什么都可以,因为不存在人所共有的统一规范和标准。

二 鲍曼所阐释的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关系

鲍曼对后现代性概念阐释的同时,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也做出了新的阐释。史密斯在鲍曼的传记中说到要想认识鲍曼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研究的精华,最快捷的方法是讲述一个故事。他把柏拉图洞穴神话加以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变成“笼中人的神话”,从而生动形象地将现代人和后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展现在我们眼前:假设现代化是一座城市,它快乐的居民没有被限制在洞穴中,而是被放置在以人类工程学方法设计好的笼子里。在每个被高科技

锁链束缚的现代笼子里都有一本生活指南,它向人们解释作为一个现代的笼中人如何过上好的生活。在他们熟悉的笼子中,现代城市的笼中人被调整得十分适应他们的现实,这里环境惬意,生活美好。然而,这一城市的天堂里有一条蛇,它的名字叫“后现代性”。这条蛇每天夜里潜入城市,打开一些笼门。每天晚上都有一些笼门被打开,笼子里的居住者从睡梦中被钥匙转动的声音惊醒,带着几分恐惧、几分好奇,他们走出笼子,在半明半暗中四处蹒跚而行,但是他们很快就失去了耐心。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模棱两可、形影不清的世界中,盘旋的雾气模糊了它的景象,没有什么是明确限定的。路标非常难读,似乎相互之间有着矛盾。这种令人困惑的地带向四面八方的深处延伸。走出笼子的居住者绝望地遗忘了他们宝贵的生活指南,它被遗留在他们习惯的笼子里。然而这些生活指南又有什么用?它们只能给予有关如何做好一个笼中人的建议,而不可能告诉你在笼子外面应该做些什么。一些人设法潜回笼子,但对他们来说,再像从前那样心满意足是困难的。他们现在知道这里存在着一个那部生活指南没有解释的人类生存状况的广阔空间。另外一些人呆在笼子的外面,也许是他们找不到回去的道路,或者他们不希望回去。无论在哪条路上,他们都处于迷惑的状态。建筑现代生活的铁栅栏不再能约束他们,但是,也不再生活指南告诉他们:他们是谁?做些什么?如何感受?如何与他人交往?他们就是后现代的男男女女。^{[4] 19-20}

在任何时候,一些笼子是锁上的,一些是开着的,一些是空着的,一些没有锁上,但是被居住者从里面插上了。这个隐喻按照鲍曼的眼光来看:

首先,现代性诞生之时,后现代性也如影相随,两者是共存的。他在答复丹尼斯·史密斯的回信中,曾用一个更为生动的比喻来审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孪生关系:后现代犹如一根刺从一开始就插入现代性的身体之中。^{[4] 227} “即使是把‘现代’与‘后现代’看作是两个相继出现的历史时期,也应认为它们之间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关系。”^{[3] 4} 由此可见,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就像是一个原子中的正、负两极,虽然是两个有差异的元素但还是处于和谐状态之中,是两种共存的实践模式,只不过在某一历史时期,因为各种因素,某一种模式会占主导地位。

其次,鲍曼所采用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概念是不同于那些显然是单纯对立的成对的概念,也不是作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同义词来运用,

所以他并不同意后现代性取代了现代性的看法,而更倾向于哈贝马斯的观点,认为现代性是一个仍“未完成的规划”。但是他与哈贝马斯的理论不同之处在于: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今天未完成的计划。言外之意,即通过调整和改善总有一天现代性还有可能实现;鲍曼则认为现代性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美好承诺,永远不太可能实现。

此外,鲍曼也并不认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是一种进步或者提升。“需注意的最后一点是,我决没有认为后现代模式是对现代模式一种提升,也决没有认为两者可以被纳入到一种进步序列中去(不管对‘进步’这一含义混乱、名声不佳的概念作何理解)。更进一步地说,我认为,后现代性的来临并没有完全取代知识分子实践的现代性模式,前者也没有驳倒后者的有效性(尽管人们可以驳倒那些一贯站在后现代立场上的观点)。我的兴趣只是在于,理解使两种模式的出现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理解导致两者之命运发生变化的因素。”^{[3] 7-8}

在鲍曼看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不仅是共存的,也是一种断裂的关系。这两点看起来相悖,可是在鲍曼这里却得到了完美的阐释。当现代性被自己的矛盾性所动摇的时候,后现代性是企图构建一个可以独立发展的、有意义的人类生存状况加以代替。现代性要求一个巨大的管理机器保持社会应有秩序和理性,管理者要求花草草按照它们应该生长的位置摆设,并且像园丁一样清理花园里让人不舒适的杂草,维护着花园的百花争艳和蓬勃生气。可惜这个把现代社会装扮成美丽花园的计划没有实现,原因是它具有自我损毁性。而到了后现代,现代性筹划的自我损毁性充分展现在世人面前,现代性的矛盾态度为后现代性的登场清除了障碍。但是,鲍曼也并不认为后现代实践是完美的,它也有自己的问题。

三 鲍曼解读后现代性的缺憾

鲍曼指出现代性实践模式也是有代价和缺憾的,如他认为现代性是大屠杀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5]“滔天的罪恶源于伟大的观念。”^[6]鲍曼还引用了美国作家辛西亚·欧齐克和德国心理学家克劳斯·多尔纳的评价——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种美学解决方案。作为文明或文化的现代性,它是关于“美”、“清洁”、“秩序”的,然而在追求美丽,保持清洁和遵守秩序的过程中,我们却付出了沉重代价。最极端的

例子就是,犹太人在纳粹时期的德国被视为“杂草”而被屠杀的事实。在纳粹看来犹太人既是肮脏的、丑陋的和危险的,又是“不适合的”、“错位的”和“弄脏了画面的”。由于他们作为“社会污染”问题的存在冒犯了美学上的愉悦和道德上令人安心的和谐感,最后犹如花园里的“杂草”一样被“园丁”(现代花园的管理者)所铲除。后现代性虽在不断反思现代性所带来的代价和缺陷,它本身及其实践模式也有其缺憾。自由与安全,就如鱼和熊掌一样对于现代生活不能兼得。如果说自由感的缺失是徘徊在现代性上空的幽灵,安全感的缺乏则是盘旋在后现代性上空的阴影。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中认为文明的缺憾是源于压抑,即人们在获得某些安全的同时,却失去了自由。鲍曼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中模仿弗洛伊德的论述,指出后现代性的缺憾是源于自由,即人们在得到日益增多的自由的同时,却失去了安全感。在现代性生活和后现代性生活中,自由与安全永远是悖论,两者永远都不能同时得到满足,总是会有缺憾。

在《文明及其缺憾》中弗洛伊德首先要说明的是一个古老的规则:“在你得到某些东西的同时,你也将失去另外的一些东西。”他认为,在没有抗议、伤心和懊悔的情况下,代表现代性的和谐、美和秩序等不能被减少,也不可能被放弃;但是,在没有付出沉重的代价时,它们是不会被拥有的。在现代生活中,人类需要被强迫去尊重和谐、秩序和美。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文明被建立在本能克制的基础之上;被理解为“现代性”的文明,抑制了人类的性欲和攻击性。因而,寻求自由的冲动,同文明的特定形式与要求相背离,或者说是与文明完全相背离。文明人必须用自身的部分幸福来换取部分安全。所以弗洛伊德提出,在文明的生活中,快乐伴随着痛苦而至,满意伴随着缺憾而至,服从伴随着反抗而至。文明是被自然而然地强加到无序的人性之上的秩序,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协定,它不断地被挑战,并且永远处在协商之中。在讨论现代性的骄傲及其所有其他成就的基石的秩序时,弗洛伊德就用了“难以抗拒的冲动”、“调节”、“抑制”或者“被迫的克制”这样的术语。这些现代性的标志,它们的缺憾源于过量的秩序和自由的缺少。受到威胁的安全要求牺牲自由,首先牺牲的是个体寻求快乐的自由。此时,快乐原则被降低到现实原则的标准。在愿意以安全的名义限制自由的文明框架内,较多的秩序意味着较多的缺憾。

在后现代的生活中古老的规则还是没有改变,同过去一样它都被认为是正确的。鲍曼认为只是获得的东西与失去的东西调整了位置:后现代人用部分的安全换取了部分的幸福。如果说现代性的缺憾源于在追求个体幸福中容忍了缺少太少自由的安全,那么,后现代性的缺憾则源于容忍了太少安全的寻求快乐的自由。鲍曼进一步指出这种安全感缺乏的根本原因是后现代生活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痛苦。“当前生活的许多特征都是导致了无法抵抗的不确定性感:导致了把未来的世界和‘力所能及的世界’视为本质上是不可确定的、无法控制的和令人危险的。”^{[6] 21}

鲍曼在论证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还引用了乔治·齐美尔的名言:任何价值都是这样的一种价值:你要想得到它,就必须承受损失其他价值的痛苦。然而,你最需要你没有的东西。所以,鲍曼指出:“当自由在安全的神坛上牺牲时,自由的光彩最为亮泽;当安全在个体自由的神殿下被牺牲时,它便偷走了以前的牺牲品——自由的光彩。”^{[6] 4}当单调无聊的白日纠缠着安全的寻求者时,失眠的夜晚就是对自由者的诅咒。如同一个已婚浪子,虽得到一张长期饭票,感到家庭稳定所带来的安全感,但在家庭伦理的秩序之下却又牺牲了许多自由,重复着枯燥乏味的令人厌倦的平凡生活。而依然我行我素的浪子,突破家庭伦理秩序的束缚,在享受自由带来快乐的同时,却在漆黑的夜晚忍受着自由带来的孤寂和酒醉的午夜的落寞。没有安全的自由和没有自由的安全一样,都不再保证稳定的幸福。对弗洛伊德和鲍曼而言,自由与安全都是悖论,没有自由的安全和没有安全的自由都是人类社会的缺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不可能获得稳定的幸福。鲍曼在《后现代

性及其缺憾》一书中,试图论证这样一个主题:我们处在不确定的后现代社会中,虽然我们能变得日益自由,然而问题是,我们不再有安全感,一切都变得捉摸不定,难以预测。这无疑就是后现代的缺憾和自由的代价。

毫无疑问,鲍曼是当代西方最惹人注目的学者之一。他敏锐的洞察力、高超的文学技巧、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不仅激发了社会学理论的想象力,而且给更多的个体带来思想的冲击和震撼。本文中后现代性概念、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及有关后现代性缺憾的论述,只是鲍曼宏大后现代性思想体系中的几枚小碎片,但却是我们了解整个鲍曼思想体系的基础,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鲍曼后现代理论中的后现代性社会理论、知识分子、后现代伦理学、美学、艺术等方面的思想。

参考文献:

- [1] [澳]彼得·贝尔哈兹. 解读鲍曼社会理论[J]. 郇建立, 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4(2).
- [2] 朱立元. 西方美学范畴史: 第三卷[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432-433.
- [3] [英]齐格蒙特·鲍曼. 立法者与阐释者[M]. 洪涛,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4] [英]丹尼斯·史密斯. 后现代的预言家: 齐格蒙特·鲍曼传[M]. 萧韶,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 [5] [英]齐格蒙特·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M]. 杨渝东, 史建华,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2.
- [6] [英]齐格蒙特·鲍曼. 后现代性及其缺憾[M]. 郇建立, 李静韬,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卫 华)